

午饭送到麦田里

梁建军

1976年,我在太原南郊区小店公社红寺村插队,夏收时节,我在食堂上工作,那时插队已两年,算是老知青了。

生产大队里晚上在队部召开“三夏”抢收动员会,会上传达了南郊区和公社的“三夏”抢收精神,村里做出了“三夏”抢收抢种的具体安排。队长要求,生产一线的社员们,要在一天三出勤的基础上,中午吃饭在麦地里,不能回家,晚饭后再加次出勤,上场打麦子。后勤和从事养猪、喂鸡、做粉条的副业人员,也要抽出劳力出早勤或参加夏收劳动。

我们是后勤人员,积极响应生产队的号召,食堂4个人,每天两人出早勤割麦子,两人留在食堂做早饭。食堂3个知青,两男一女,还有村里的大师傅石大爷。我



我的小聪明

张灯

我没有大智慧,但我有小聪明。没有大智慧似乎不需要证据,而有小聪明,却需要拿出点真货。

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,我正在山西大学读书。原生态的脚不达标,宽有余而长不足,买鞋成了最大的难事。那时,塑料凉鞋流行起来,我也想赶时髦,但一试,按宽度,40码刚勉强,按长度,38码都嫌多。咋闹?办法不是人想出来的吗?动动小脑筋,嗨,有了。我买了双40码的,到了舅舅家,先比划好尺寸,从鞋底中间横着剪去了近一寸,然后让表哥把小铁铲在火上烧热,我则两手把着凉鞋两端,在铁铲抽出的瞬间对接上去,再用热铲把接头烫齐、烫平。凉了一试,正好!从此我不再为买凉鞋发愁。

过了几年,我毕业了,直接分配到雁北应县中学任教,后来又下放到西北乡的帖庄学校。学校不大,挨着大队饲养院,就是一排十来间房,办公室只一个,就一间,还兼做厨房、食堂、宿舍。只有一个吴姓的老师住校,就睡土炕。校长姓高,安排我也睡炕。可我一看,炕连着锅灶,是火炕,一天三顿饭,这热得怎么睡?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没睡过炕。”校长无奈:“咱这条件太差了。”他想了想:“要不看看这间?”随着校长到了大门边的一间小屋,没有炕,地上乱七八糟堆放着杂物,我

们一商量,两个男知青早晨割麦子,谁知,女知青任彩玉坚持要参加,就由刘志义和石大爷做早饭。

第二天一早,天刚放亮,村里的喇叭就喊了起来:“社员同志们,社员同志们,割麦子的,割麦子的,下地了!下地了!”我们立即起床,有的还睡眼蒙眬,脸也顾不上洗,牙也来不及刷,拿上镰刀就去院里的磨石上磨镰刀,我也急忙去磨镰刀。常言道,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

到了地里,每人3垄,先到先割,一堰子地有100来米长,割到地头收工。清晨的麦田里还是很凉爽,我们弯下腰,一手抓着麦子,一手挥镰割麦,割倒就放在地垄上,麦地里只听“沙沙”的割麦声,没人说话。插队两年没白干,和新来的知青比,我们割得利索,一会儿就走到了前面。割到头,我们返回来,用麦秸换个绳,把麦子捆成一捆一捆的,任务就完成了。

中午,按要求,我们要给割麦子的四五十号知青送饭到麦地。从地里回来吃过早饭,来不及休息,我们就开始准备午饭。知青多喜欢吃面条,要煮好送到地里,也要走一二里路,我们尽量把面和得硬一点。11点半,我和刘志义就担上两个桶,出发送饭,一路上两个后生换着挑。一只桶里放着面汤,汤里有面条,怕面条粘在一起。另一个桶里放着粉条白菜,算是改善了生活,另外还带些馒头、玉米面窝头,以备选食。

到了地头,队长就招呼社员们休息,大家放下镰刀吃饭。那天,给知青打饭时,比平时打得饭量都多一些,还带些醋调和,大家也饿了,吃得狼吞虎咽,吃了面还喝碗面汤,感觉吃着熨帖。回来一核算,饭票收得还不亏,知青回来也叫喊,今天饭给的挺多,就是不耐饿。原来,一路走上面条泡在汤里都涨了,看着多,虚胖。

又到了麦收季节,村里发展真快,都用上了联合收割机,再也不用“一天四出勤”,也不用往地里送饭了。



那棵沙枣树

刘守林

过去,我老家的院子里有棵树,这棵树很粗、很壮,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,灰绿色的叶子浓密,与褐色的树皮、紫红色的树干搭配得很和谐。

父亲讲,这棵树叫沙枣树,是北方特有的树种,是曾祖祖父他们那一辈人年轻时栽种的。一百多年风风雨雨与我的长辈们朝夕相伴,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,也成了村子里的一处景观。沙枣树一年四季引来无数喜鹊、麻雀和各种蜂蝶,为院子增添了生机。每当谷雨前后,伴随着绿叶的生长,树冠上便泛起一层淡黄色的小花。小小的黄花呈五角形,在北方强劲的春风吹拂下,展示出朴实、顽强的风范。几天后,花谢了,叶密了,到了初夏便绿荫蔽日,又遮严了半个院子。于是树荫下便成了我们纳凉、吃饭、小憩、听故事的好地方。

懂得一些中医知识的父亲说,沙枣还有健脾胃、安神、镇静、止泻的作用,在日常食用中,也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。因此我每天看着那枣树上的一串串小枣发呆。一次,我在树下做作业,突然一颗枣落在脚边。看着这颗只与花生米相当的枣子,我不由想流口水。枣的颜色大体上与叶子一样,皮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小麻点儿,朝阳的一面略显出黄色。我试着咬了一口,涩涩的,但很快觉得有股淡淡的甜味。枣核很大,果肉仅仅是一层皮,但吃起来别具风味。

每到秋天,我家的院子可热闹了。不时有一些淘气、顽皮的男孩子爬墙头、上房顶、攀枝权,去揪树上还发着青的枣子吃。我很不情愿别人来摘我家的胜利果实,便冲他们大声喊。哪知刚一出口,男孩子一个个像惊弓之鸟,急急忙忙往下逃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,从房顶上漏下一个人来。我想:糟糕!房顶漏啦,人肯定摔坏了。早知如此,就不去惊动他们。这时,只见漏下来的男孩从房里的炭堆上爬起,满身是土,狡黠地做个鬼脸后,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走了……

沙枣树伴随着一茬茬孩童度过了愉快的童年。我为我家曾经有这棵沙枣树而自豪。



参加演出

李全达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我刚上初一,在一次学校文艺汇演中,我们初五班要出节目,班主任王海生老师从班里挑选了8名同学,推荐给校文体老师李国栋,我被选中了,从此我便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一员,心情即兴奋又激动。演出的节目有相声、歌舞、学唱现代京剧,我们班参加汇演的节目是歌舞《丰收舞》《军民联防守边疆》和相声。

我参加汇演的节目是两个歌舞。为确保演出成功,我们可下了功夫,没少苦练动作,整体配合排练。李国栋老师一到体育馆就把我们组织起来排练,给我们示范每个动作,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和表达的意思。刚开始,我们有点羞涩,动作放不开,后来在班长任金枝的带领下,大家才开始放开表演。《丰收舞》要求要跳出劳动人民丰收后的欢快心情,表情要喜形于色,四肢和腰要协调统一,手舞足蹈。四男四女,动作要协调统一,不时还有穿插。那时条件差,我们腰上系的彩绸确切地说是彩色布条。另一个节目是《军民联防守边疆》。我们表演的是三名解放军和四名民兵共同巡逻的故事。我是解放军战士之一,身穿绿军装,身披白斗篷,巡逻在边防线上,一会儿手遮阳光放眼望去,一会儿招呼跟随的民兵兄弟,一会儿做出骑马的动作,手风琴伴奏,形象真实,颇有“军民团结如一人,试看天下谁能敌”的气势,鼓舞着学校风华正茂的学生。

演出那天早晨,我早早起来,穿上白色的粗布衬衣,是母亲自己织的布亲自做的,穿上缀有红领章的绿色军装,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,这都是从一位当兵的亲戚家借来的,我快乐地向距家三里的学校奔去。

忘记是第几个节目了,记忆犹新的我们的演出赢得了多次鼓掌,最后学校还给我们初五班颁发了团体奖,大家的快乐兴奋溢于言表。

一次演出,又好像是人生中一次历练,深刻印证了台上一分钟、台下十年功的道理。人生的每个阶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

一把“一刃斧”

郝妙海

那日,在母亲房内,原本是想找一把移花用的小铲子,不承想,却从衣柜下掏出一把斧头来。看着这把锈迹斑斑的斧头,不禁感慨万分。

我本应在1966年就毕业并参加高考,却因“文革”而滞留学校三年。1969年,我无奈地返回了我的故乡——太原市郊的武家庄村。返乡后,正赶上我们生产队的老木匠实在干不动而“退休”了。我则因前两年逍遥在家无事做,跟着住在家中的一个文木匠学了些皮毛手艺,于是没干了几天农活,就被队长安排当了木匠。

当年,生产队的木匠,无非是修修农具,修修平车,修修茅桶,或帮社员们做做屋架,做做门窗……然而,活儿看似简单粗糙,该有的木匠工具却一样也不能少。而当时,自己好像也喜欢上了这一行。于是,我在原有的基础上,或置,或制,很快就配齐了一整套工具。记得,光刨子就有长刨(木板拼缝用)、中刨(一般刨光用)、精刨(最后精加工木活表面用)、圆刨(外圆刨刨光手把农具的把柄等,里圆刨修茅桶用)、槽刨(刨槽装嵌木板用)、边刨(装镶玻璃等用)、线刨(门窗及家具上做花饰

用)等十几种。其它锯呀,凿呀,也是多种多样。但斧子却只有一把,就是眼前这一把。斧头当然是买的,斧把却是找了一块老槐木板精心配上的。

我的这把斧重约1公斤,挥动时既不显重,又有一定惯性,可谓得心应手。另外,它顶上是个约30mmx35mm的平面,下面则扩为一个宽约70mm的刃,总长约150mm,可满足木作时的全部功能。它最显著的特点,则是由一个长方体收缩为一条线(刃)时,一个平面延展,只有另一个平面收缩为一个向内侧略带弧的斜面,以使其更便于砍削。而基于这个特点,匠人们、乡民们形象地称其为“一刃斧”。

而由于一刃斧这个独有的特点,民间便有了一句拿其来说事的俗语,叫“一刃斧砍人”,用来形容有些人拉偏架,以及说话办事对人不对己的不公平现象。

稍有点遗憾的是,我的木匠生涯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。1972年,村里筹办一个造纸厂,我由于有点文化,便被抽出来参与建厂。从此,便与木匠这一行彻底告别。而那林林总总几十件木匠工具,也因几次搬迁,特别是随着城中村改造,丢的丢,扔的扔,几无一遗存了。这件斧头的意外出现,竟让我有了一丝丝惊喜。